

实心实意 尽心竭力 坚持不懈

天津7年为市民办实事百余件

据新华社天津9月5日电 (记者贾宏义) 由于天津市政府尽心竭力为人民办实事, 经过8年多的时间, 一个新的天津已初见端倪。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 1981年的天津到处是临建棚、垃圾堆, 市民喝咸水, 交通常堵塞, 群众情绪低落, 领导的威信也降到最低点。天津市委、市政府决定当年拆除全部临建棚, 可是当李瑞环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时, 台下却哄然大笑。认为是吹牛。

市委、市政府一手抓住宅建设, 一手抓纠正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 规定到底哪里的群众还有住临建棚的, 哪里的领导就得把自己住的住房腾出来让给群众。1981年12月, 全市建成256万方米的住宅,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5万间临建棚如期全部拆除, 十几万人从潮湿、阴暗、狭小的防震棚搬出, 住进宽敞明亮的新住宅。此后, 天津又引来了滦河水, 使市民告别了喝咸水的日子。

天津市政府从市民的情绪变化中悟出一个道理: 只有实心实意、尽心竭力, 坚持不懈地为群众办实事, 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于是, 从1983年开始, 天津市政府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从第一年的为城市居民办10件实事, 发展到以后每年为城乡人民各办10件实事。每年年初公布于众, 得到监督, 年末公布实绩, 取信于民。

据统计, 7年来天津市政府已为市民办实事130件, 其中包括518个项目。内容涉及市政建设、市场供应、稳定物价、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等。

近几年, 国家进行经济压缩、调整, 地方资金有困难, 但天津市仍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 每年坚持为市民办20件实事, 并千方百计办好, 以取信于民。李瑞环说, 资金减少, 为人民办实事的劲头不能变, 物价上涨指数近两年多一直低于全国主要大中城市水平; 人民希望有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天津市政府就采取综合治理方针, 使全市刑事案件发生率保持全国最低; 群众反映上下班交通拥挤, 市政府就修路架桥, 增加公共汽车和线路, 8年为市民换房43.9万间, 方便了群众。

为了确保办的每一件实事都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 天津市广泛开辟渠道了解民情, 体察民意。如户卷调查, 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话、群众信访、谈心服务、城市信息网、现场办公、走访居民区、请教政府咨询委员会等。

政府为人民办实事极大地振奋了群众自尊、自爱、自强和自立精神。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 85%以上的市民为自己是一个天津人而感到自豪, 84%以上的市民表示愿意参加义务劳动, 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新天津。

内地香港紧密合作有利双方

郑华在港胞国庆筹委会上指出

本报香港9月5日电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华昨天在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指出, 前些日子, 尽管发生了“北京风波”, 但是, 中国领导人一再郑重声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及中共三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改变, 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所制定的关于港澳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不会改变。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表态是真诚的, 说话是算数的。有了“一国两制”的方针, 有了中英联合声明, 再把这些基本法的工作做好, 我们就有了实现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 就有了维护港澳长期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

他说, 香港同胞和祖国人民一起走过了40年的路程, 40年来, 共同的民族感情, 共同的经济利益, 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祖国与香港唇齿相依, 密切合作, 共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他还说, 40年来, 内地与香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改革开放以后, 内地与香港原有的贸易往来规模迅速扩大。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和合作日趋密切, 前景良好。这些事实表明, 两地之间这种紧密合作, 互惠互利的关系, 已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识和接受。

各国议会联盟第82届年会 否决干涉我内政提案

本报伦敦9月4日电 记者陈特安报道: 在今天下午4时开始的各国议会联盟全体会议上, 联邦德国议会代表团提出了所谓“中国镇压和平抗议者”的提案, 企图把它作为“补充议题”强加给本届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杨浩在大会上当场予以驳斥, 指出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

大会就此“提案”进行表决, 结果以393票反对, 509票弃权, 335票赞成而被否决。大会的这一结果恰恰证明了国际上有关人士这样一种呼声的正确性: 中国内政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孤立。

各国议会联盟第82届年会在今天上午在美国开幕。会议为期6天将于9日闭幕。

不幸与幸运

重庆市长寿化工总厂 谭诗亮

人生最大的不幸, 莫过于从小就失去一双健康的腿。然而, 每当我回忆起这33年的生活往事, 心里总是暖暖的。

据老人们说: 也许是我们祖家的祖坟没埋好, 或者是祖辈们造了孽, 留下了我的三伯和我这两个“现世宝”。可是, 由于我们爷儿俩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里, 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解放前, 我的三伯患了半身不遂。那时候, 穷苦人家, 好脚好手, 身强力壮的男子求一点温饱尚不可得, 何况我三伯? 为了生活, 可怜的三伯也只得拖着残身病体, 一步一步挪地上山开荒种地。遇上天旱水涝, 就只好沿街乞讨了。直到三十好几, 他才勉强娶了一个媳妇, 生了一个儿子。但“好景”不长, 由于经受不住穷苦生活的煎熬, 我三伯撇开三伯和幼子走了。可怜我的三伯, 忙忙碌碌, 累死累活, 到头来也只得得黄泉裹身。

每每听到母亲谈起这些往事, 我总不禁有些黯然。然而, 联想自己的生活环境, 又总感到格外的温暖。真是一个人在天堂, 一个在地狱。

我出生8个月的时候, 因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双腿瘫痪。但父母并没因此而嫌弃我。每次缝新衣, 总有我的份; 每次吃好的, 总是我多些。

在学校, 在老师和同学们中间, 我仿佛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我忘不了, 第一堂课, 当老师讲的“雷锋叔叔的故事”一完, 同学们就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他们争着要帮助我。

老师笑了, 我却哭了。从此, 多少个酷暑, 多少个严冬, 同学们背着我上学, 放学, 背着我上电影院、进图书馆。

我忘不了, 老师亲手赠给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总忘不了, 她亲手给我系上的红领巾。我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她像枯槁者一样, 用辛勤的汗水浇灌我; 我是一株微弱的幼芽, 她像园丁一样, 用抚爱的温暖浇灌我; 我是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 她像母亲一样, 用知识的乳汁哺育我。当我双手捧着红彤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尔基学校毕业证书”时, 我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这是幸福的泪, 感激的泪!

如今, 我参加了工作, 成了一个不能仅靠自食其力, 而且能对社会尽义务的人。我也娶了爱妻, 有了娇女。全家人敬爱、和睦和睦。家里还买了彩电、冰箱, 并且搬进了新房。

这一切, 我三伯恐怕是想都未曾想过的。

首都国庆市场货源准备就绪

各类商品供应可望好于往年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顾世贵报道: 进入9月, 首都迎接国庆的各项筹备活动正在抓紧进行。日前, 记者从首都庆祝建国40周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届时将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 体现隆重、热烈又力求节俭和实效的精神。与此同时, 记者还了解到北京

商业职工为确保首都国庆市场丰盛而全力以赴。日前, 各项筹备工作已大体就绪, 节日期间商品货源已基本落实。

据市商委副主任张锡林介绍, 今年首都国庆市场货源比往年丰富, 各类商品供应好于往年。国庆期间, 市属商业主营批发公司、四大商场和区属商业企业重点安排了71种(类)节日商品, 货源总值21.35亿元, 比去年同期实际

销售16.31亿元, 增长30.9%。这是历年不曾有过的。粮油食品、副食品、货源充足, 品种较多, 可以保证供应。猪肉、牛羊肉投放量大于往年。为了稳定市场价格, 9月份对黄瓜、大椒、元白菜、土豆4个品种实行限价。限价品种数量占货源总量的60%以上。糖果、罐头的货源也充足, 品种也齐全。节日期间安排优质白酒比去年同比增长33.4%, 安排各种卷烟

王丙乾谈税收工作重点

切实整顿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所得税秩序 促使个体和私营经济合法经营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王锦铭报道: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今天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重申, 整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所得税秩序, 决不是不要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 也不是加重他们的税收负担, 而是要依法把他们应纳未纳的税款收上来, 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政策, 促使其合法经营, 健康发展。

王丙乾说,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中, 确有不少是靠非法经营和偷税漏税, 牟取暴利而“暴富”的, 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 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现在, 国务院决定对这方面的税收秩序进行整顿, 是十分必要的。各级税务机关应把它作为工作重点, 切实抓出成效。

王丙乾指出, 必须继续搞好清理整顿减免税工作。要坚决纠正那种不顾税法, 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认为有效益就可减免的变相“包租”的做法, 防止通过减免税去搞基本建设, 形成新的投资膨胀。要取消对各类公司的减免税优惠, 限制公司的盲目发展。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于今日在北京结束。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今天说, 发展中国要共同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同时要有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来从事各自的建设。

乔石是在会见由地区领导候补成员阿德南·萨勒曼率领的伊拉克复兴党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在交谈中, 乔石对伊拉克战后集中力量进行国家重建工作表示赞赏。

乔石说, 中国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对过去10年进行了反思。他指出, 中国在过去10年中所执行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 这些方针和政策还将继续贯彻执行下去。

乔石向客人们简单介绍了几个月前中国首都北京所发生的事情。萨勒曼认为, 中国发生这些事情是正常的, 现在暴露出来比较好。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平息暴乱表示理解。

乔石和萨勒曼在交谈中对中伊两党和两国关系在近年里不断向前发展表示满意。

伊拉克复兴党代表团是应中国共产党邀请于9月3日来北京对中国代表团进行访问的。代表团此次来访的主要是就重大国际问题和两党关系同中国方面交换意见。昨天, 中联部部长朱良因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什么叫“反腐败的胃口”? 用句时髦的话说, 就是对反腐败的期望值; 用句通俗的话说, 就是希望反腐败能抓出多大的“老虎”。

随着党中央领导的大反腐败斗争的迅速展开, 这个“反腐败的胃口”问题迅速变得日益突出。在有些同志看来, 抓出贪污、受贿几万元、几十万元的处级干部已经不算什么了, 局级干部也管不了, 最好是抓出若干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来, 那才叫反腐败“坚决”、“彻底”, 否则, 反腐败就不能说“动了真格的”。对于这种越来越高的“胃口”很需要一番调整。

不错, 我们反腐败必须态度坚决, 依法办事, 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绝不能用什么“腐败难免”为借口, 姑息养奸, 也不能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但是, 对党和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这就是: 第一, 我们党和政府从总体上是好的, 广大党员、干部, 包括高级干部子女, 大多数也是好的、比较好的。第二, 党内、政府内确有腐败现象, 有些人的问题还很严重, 必须坚决惩治。这样两点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如果不是坚持这样的两点论, 而是偏倒过来, 认为腐败是党和政府的本质, 似乎揭出了的贪官污吏越多越好, 越大越好, 那就错了。这样看问题, 就必然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前一段有些人之所以会接受动乱、反革命暴乱策划者借“反腐败”进行的蛊惑宣传, 是与这种心态有关的。

认识任何事物, 都应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反腐败也不例外。我们既要克服对反腐败没有“胃口”一不感兴趣的错误倾向, 也应防止把“胃口”吊得过高、过大。

周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参加

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丁关根、宋任穷、温家宝、王平、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杨得志、肖克、余秋里、宋时轮、陈丕显、陈锡联、姬鹏飞、习仲勋、严济慈、康克清、赵朴初、胡绳等同志, 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并献了花圈。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王铁快、薄一波、王首道、李一氓、李德生、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胡乔木、段君英、耿飚、黄华、黄镇、康世恩、程子华、周谷城、王任重、周培源等同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纪检检查委员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和益阳市党政机关及周扬同志生前友好, 送了花圈。

周扬同志原名周起应, 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流亡“4·12”反革命政变后, 他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毅然参加中国国民党, 开始了他的革命战斗生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周扬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 周扬同志一直处于文化界和艺术界思想工作的领导岗位, 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和思想理论工作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60年代初, 江青对文艺界粗暴干涉和肆意摧残, 周扬同志进行了抵制, 受到江青的忌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周扬同志即遭诬陷并被公开点名批斗, 随即被投入监狱, 长达9年之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他进行长时间的迫害, 使他身心备受摧残。然而, 周扬同志仍然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 始终相信党, 相信人民, 在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粉碎“四人帮”后, 周扬同志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是中共第

十一届中央委员, 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国务院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名誉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周扬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革命文化事业。周扬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忠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贡献, 他的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光辉业绩, 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史册。

周扬同志的遗体火化后, 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骨灰盒上覆盖着共产党党旗。

江泽民总书记向周扬亲属表示慰问

新华社记者 李平摄



共和国与我一国庆抒怀

征文

我国畜禽养殖迅速发展

本报讯 记者**康健**从农业部获悉：今年我国肉类总产量预计可达2500万吨左右，禽蛋年产量可达704万吨左右。这样，我国的禽蛋年产量将跃居世界第一，肉类总产量居世界第二。

畜禽养殖业是我国解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产业。现在全国已有各种畜禽良种场1370个，牧草种子生产基地12个，有较先进的检测设备的饲料检测站110多个，全国生产加工饲料的能力已超过2000万吨。

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现代化养鸡场探索，对提高我国禽蛋和肉类产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全国已建成禽畜生产基地419个。从事畜禽生产的专业户超过90万个，各类畜牧经济联合体达4400多个。80年代以来，东北奶牛场、中原肉牛带及南方大片水禽基地建设都取得了明显效果。

据介绍，今年年末我国生猪存栏可达3.38亿头，大牲畜存栏可达1.27亿头，家禽可达2.27亿只。人均畜产品占有水平为：肉类22.5公斤，禽蛋6.3公斤，奶类3.6公斤。畜牧业从整体上讲已不再是农业的“副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农业中富于生机的产业之一。

我国超导研究连获成果 参与国际竞争保持领先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杨良化**报道：在当今国际科技竞争最激烈的领域里，中国科技人员以自己二连三出色成果，继续保持超导研究的领先地位。今天在这里召开的北京高温超导国际会议提供的情况表明，以不断出现的超导应用为标志，人类正在逼近超导时代的大门。

与此同时，我国还发展了有特色的高温超导材料的材工艺，制备出临界电流密度高于11000安培/厘米²的钇系材料和100万安培/厘米²的钇系超导薄膜。应用高温超导材料，我国还制成了用于地质勘探和生物磁性测量的仪器。在高温超导技术的物理特性、微观机理等方面，我国科研人员也做出了较好的成果。

- ▲国务院总理李鹏9月4日在中南海会见由墨西哥电视公司副董事长何塞·加亚斯吉率领的墨西哥广播电视代表团。
- ▲外交部部长钱其琛结束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乘飞机于4日中午返京。他是上月30日赴蒙访问的。
- ▲中共中央常委、中联部部长朱良4日同地区领导候补成员阿德南·萨勒曼为团长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谔4日在北京宴请了由李斗益大将率领的朝鲜人民军休战团。
- ▲应拉美地区邀请，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覃自龙为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部友好访问团4日离京，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访问。

（新华社社）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周扬同志，长期患病，久治无效，于1989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周扬同志原名周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他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斗争生涯。周扬同志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后，参加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1932年重新入党，担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艺总盟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报《文学月报》。在此期间，他在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同志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文化“围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向我国文艺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在1933年，将苏联文艺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他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资产阶级错误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其他同志一起倡领导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作了积极的努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同志于1937年离上海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率领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出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倡导新秧歌运动，热情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推动了一批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创作问世。他在解放区的文艺建设和培养革命文艺人才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7月，平津解放后，他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介绍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9月他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扬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周扬同志一直处于文艺事业和宣传思想工作的前线，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思想理论工作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60年代初，江青对文艺界粗暴干预和肆意摧残，周扬同志进行了抵制，受到江青的忌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同志即遭诬陷并被公开点名批判，随即被投入监狱，长达9年之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他进行长时间的政治人身攻击，倍受摧残。然而，周扬同志仍然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的信

念，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同志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周扬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热情倡导思想解放，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注意对“左”的思潮的检查和批判，在文化艺术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中央领导下，他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他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在这次继续开来的文代会，他当选为文联主席。周扬同志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拥护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决策，拥护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

周扬同志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他胸怀广阔，顾全大局，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前爆发的。

中央关于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公告是4月19日晚才公布的。而在16日，受控于畸形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华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6（22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18日，李淑娟又向王丹投意：“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在22日之前，无论是18日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还是20日凌晨冲入新华门，都是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为这一天所作的准备。

许多大学生是怀着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来参加一些活动的，但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掀起一场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

4月15日下午，耀邦同志去世几个小时，清华大学就贴出了“李鹏辞职”的标语。晚上，北京大学出现了大字报：“我们要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16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贴出了：“悼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丁邓公；说千条道万条不如加神四条。”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至22日前，首都高校的大字报已有上千份。

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也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播着。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登出一位港人的目击日记说，4月18日晚，他在天安门广场听大学生们演讲，一学生说：“中国只有一党专制，就是官僚，打倒共产党一党专制。”众人大笑，有喊“不现实的”，有鼓掌的，还有起哄的。

一些文艺界“精英”们也积极地做着舆论准备。15日，《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文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准备召开座谈会。在19日的座谈会上，严家其、戴晴等人提出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彻底否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暗示要“倒邓保赵”。

《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将刊有这个座谈会内容的报纸提前印刷，赶在22日之前发往北京，以“影响舆论”。

21日这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给中央、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各重点大学的校园，其内容与王丹等人18日所呈请愿书如出一辙。在请愿书的旁边，已贴上了所谓“澄清4·20血案真相”的大字报及“到天安门去参加追悼会”的通知。

一股狂躁的情绪就这样在大学生中点燃起来了。21日下午，北大青年甚至传出了“耀邦是被最高统帅打死的”谣言，有的学生竟高呼要“戴罪”。“晚上，北师大闹一片混乱，外校学生搬开了校门，上万人出进出进要开什么‘誓师会’。吾尔开希拿着喇叭在操场上煽动大家‘讨还4·20血债’。还有人用自行车驮着一大袋白灰进到人群中分发，被一些高年级学生制止了。”

山雨未来风满楼。借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大闹一场的风波似弦上之箭，一触即发。海外的一些新闻媒体也已按捺不住地发出了信息。21日这天，台湾《中央日报》印出了大标题：“大陆将爆发更大动乱”；香港《东方日报》刊出醒目标题：“明天将闹什么，学生可能冲平场。”美国《华盛顿邮报》则干脆引用北京某大学生的话：“悼念胡耀邦只是示威者的借口”。

22日凌晨，数万大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便满地而坐或倒头入睡，有的在纪念碑附近的草坪上嬉谈谈笑。许多学校推出的学生代表也不清楚天亮之后干什么好。

午夜两点多钟，在临时召开的众多所高校代表会议上，郭海峰指出，首先要搞和平请愿。在追悼会前，要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平接见，进行谈判。如果不行，就冲入大会堂。各校学生代表一听，上都表示不同意。在人家办丧事时去闹灵堂

现场，还有第二手计划。在21日这天，王丹、郭海峰、封从德、熊政等“北大团结学生筹委会”的核心成员秘密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封从德把18日已递交过的请愿书重抄一遍，“利用这个许多学生在场的机会，在追悼会后进行请愿”。

这个一直只有几个人知道的阴谋是在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的车队已离开大会堂的西门口才突然公开的。大约10时50分，广场西端猛然响起了“对话！对话！”的叫声，继而又喊起了：“李鹏出来”、“李鹏闭嘴”等口号。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则站到了离大会堂最近的学生队伍前面。

随着喊声越来越大，封从德从北大队伍里将一大卷纸传给郭海峰，示意他：“交给李鹏”。11点20分左右，郭海峰高举请愿书，向人群示意，吾尔开希拿着喇叭在他身边喊叫着与另外两名大学生一起向大会堂走去。

在大会堂台阶下，郭海峰对闻讯赶来的治丧办的同志说：“我们要交请愿书。”吾尔开希接着说：“我们要交给李鹏，非面交不可。”治丧办的同志提出让他们派代表进入大会堂，吾尔开

希拒不同意，他坚持道：“李鹏出来是第一要求，除此之外，放弃一切要求。”并下了通牒：“12点45分是最后期限。”

12点整，一位负责人匆匆从大会堂出来，问治丧办的同志：“能不能让学生让开通道，灵车绕广场一周？”治丧办的同志又反复劝说吾尔开希等4人：“你们既然是来开追悼会的，就应先送耀邦英灵！”但他们就是一句话：“让李鹏出来！”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周围的道路上已挤满了人，学生队伍还在不断往大会堂涌。赵紫阳同志曾登上大会堂顶，用望远镜看了看这一情景，但没做任何指示，便驱车离去，准备打电话求李鹏去劝。

尽管有些头脑清醒的大学生、研究生已感到事先无任何招呼，即要求李鹏在不能出来的时候，不可能交谈对话的地点，接受本不属于他职责范围，并已经递交过的请愿书是很荒唐的，更不赞成他下跪的方式，但是，他们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疑问了。整个广场哭喊一片，群情激愤的大学生向大会堂冲过来。一女学生喊着“打死我母亲”，拼命向警察撞去。

郭海峰等人跪了十几分钟后才走了下来，学生的对立情绪已达到顶点。回到广场的吾尔开希和一些学校的代表开了个会，不到两点，学生队伍开始撤离广场，向新华门方向游行，并喊出了统一的口号：“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22日晚，令人奇怪的事还发生了一些。下午，参加追悼会的学生刚刚回到，北师大的传单就撒到了他们手中。传单写道：“12·30，师大的代表告诉同学，李鹏将于12：45接见学生。”下午2：00，李鹏还未出来。同学们愤怒地向前面去，武卫冲上去用皮带等殴打学生……

这日上午11时，严家其、苏晓康等人“要求政府对话”，“绝不允许对学生施暴”的请愿书贴在了北师大高校的墙上。

方励之在当天对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得意地说道：“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发展就不乐观。”王丹也高兴地告诉外国记者：“相信行动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天，由台湾反独组织“中国民联”成员胡平、陈平、刘晓波等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求“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

《新观察》杂志则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先是造谣北京市公安局“戒严”，然后称赞学生强占天安门广场，使“追悼会的主会场在大会堂外”。中午，3名大学生“扑通”跪倒在大会堂台阶上，要求向国家领导人面交请愿书。向警察闹工人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十数万大学生代表。”并煽动道：“他们住地下一层，就把官僚主义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下，北京6万大学生要课了。一些人开始南下北上，东来西走，串联募捐。外地许多大学生也相继效仿。

同一天，西安和长沙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

王丹早在4月16日就说，大字报的“锋芒所指开始转向”，“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与‘五四’相连。”不少人寄希望于我引导方向。”从4月16日至4月22日这一个星期，他和他的小团伙以及背后的极少数人紧锣密鼓，到4月22日这一天又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大骗局，目的就在于把更多不明真相的大学生进一步“引导”向动乱的泥潭。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周扬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他的贡献，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史册。

让我们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错误思潮，努力加强宣传、思想工作，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新华社社）

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

一九八四年五月，巴金、周扬同机赴日本访问前在上海机场合影。

新华社发



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扬（左）在延安飞机场交谈。

新华社发

希拒不同意，他坚持道：“李鹏出来是第一要求，除此之外，放弃一切要求。”并下了通牒：“12点45分是最后期限。”

12点整，一位负责人匆匆从大会堂出来，问治丧办的同志：“能不能让学生让开通道，灵车绕广场一周？”治丧办的同志又反复劝说吾尔开希等4人：“你们既然是来开追悼会的，就应先送耀邦英灵！”但他们就是一句话：“让李鹏出来！”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周围的道路上已挤满了人，学生队伍还在不断往大会堂涌。赵紫阳同志曾登上大会堂顶，用望远镜看了看这一情景，但没做任何指示，便驱车离去，准备打电话求李鹏去劝。

尽管有些头脑清醒的大学生、研究生已感到事先无任何招呼，即要求李鹏在不能出来的时候，不可能交谈对话的地点，接受本不属于他职责范围，并已经递交过的请愿书是很荒唐的，更不赞成他下跪的方式，但是，他们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疑问了。整个广场哭喊一片，群情激愤的大学生向大会堂冲过来。一女学生喊着“打死我母亲”，拼命向警察撞去。

郭海峰等人跪了十几分钟后才走了下来，学生的对立情绪已达到顶点。回到广场的吾尔开希和一些学校的代表开了个会，不到两点，学生队伍开始撤离广场，向新华门方向游行，并喊出了统一的口号：“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22日晚，令人奇怪的事还发生了一些。下午，参加追悼会的学生刚刚回到，北师大的传单就撒到了他们手中。传单写道：“12·30，师大的代表告诉同学，李鹏将于12：45接见学生。”下午2：00，李鹏还未出来。同学们愤怒地向前面去，武卫冲上去用皮带等殴打学生……

这日上午11时，严家其、苏晓康等人“要求政府对话”，“绝不允许对学生施暴”的请愿书贴在了北师大高校的墙上。

方励之在当天对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得意地说道：“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发展就不乐观。”王丹也高兴地告诉外国记者：“相信行动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天，由台湾反独组织“中国民联”成员胡平、陈平、刘晓波等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求“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

《新观察》杂志则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先是造谣北京市公安局“戒严”，然后称赞学生强占天安门广场，使“追悼会的主会场在大会堂外”。中午，3名大学生“扑通”跪倒在大会堂台阶上，要求向国家领导人面交请愿书。向警察闹工人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十数万大学生代表。”并煽动道：“他们住地下一层，就把官僚主义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下，北京6万大学生要课了。一些人开始南下北上，东来西走，串联募捐。外地许多大学生也相继效仿。

同一天，西安和长沙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

王丹早在4月16日就说，大字报的“锋芒所指开始转向”，“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与‘五四’相连。”不少人寄希望于我引导方向。”从4月16日至4月22日这一个星期，他和他的小团伙以及背后的极少数人紧锣密鼓，到4月22日这一天又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大骗局，目的就在于把更多不明真相的大学生进一步“引导”向动乱的泥潭。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周扬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他的贡献，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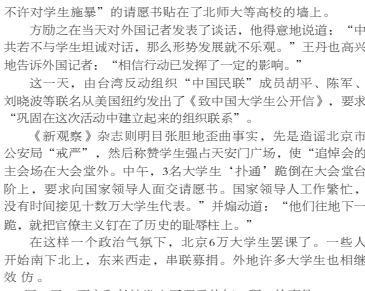
让我们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错误思潮，努力加强宣传、思想工作，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新华社社）

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

一九八四年五月，巴金、周扬同机赴日本访问前在上海机场合影。

新华社发



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扬（左）在延安飞机场交谈。

新华社发

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

一九八四年五月，巴金、周扬同机赴日本访问前在上海机场合影。

新华社发



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扬（左）在延安飞机场交谈。

新华社发

大学生的误区与社会的误导

——风波过后的回顾、反思与启示

程元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从4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全国有80多个城市，600多所高校、280万人次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仪之门——新华门被多次冲击；
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被一些学生占据达20余天之久；
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院校学生长时间罢课；
许多校园里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的大小字报四处张贴，“学生自治会”的广播大肆鼓噪，散布谣言，发表攻击性的言论；
……

由学潮到全国性的动乱，发展到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多少善良的人们感到忧虑、震惊、迷惑。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下，经过血与火的搏斗，粉碎了动乱制造者们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中国避免了一次历史的大倒退。

风波过后，人们在庆幸之余，不免陷入深沉的反思。为什么这么多的青年学生被卷入学潮和动乱？许多大学生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我们是爱国的，我们是想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的，我们要求惩治‘官倒’、根除腐败，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怎么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悲剧能否重演！痛定思痛，我们需要正视已发生的现实，需要痛苦而又诚实的反思，需要面向未来的觉醒。

热点与轨迹——

一条时起时伏的曲线

1978年，开始了我国高等教育又一个新的纪年。“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大学生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经过国家严格的考试，登上了大学的殿堂。他们作为胜利者，内心的喜悦抚平了以往的失落，同时痛惜时光的流失，青春年华的消逝，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成为大家普遍的要求，“成才”成为大家共同的热点。

1978年的意义不仅在于教育，这一年所开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大学生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标志着大学生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融。他们在拥护和欢迎的同时，伴随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许多重大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着痛苦而又激烈的反思、辩论。他们抚摸着自己在“左”的影响下的伤痕，对个人迷信、“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表示深恶痛绝，同时也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了困惑和疑虑。在一些学生中萌发着“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

此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虚而入。1980秋冬在一些高等院校发生的“竞选”风潮，可以说是这些潜在思想问题的反映。

1980年春关于“潘晓”一封信的讨论，时隔不久关于“自我设计、自我成才”观点的流行，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进入中国大学校园，在大学生中引起层层波澜。“人”和“自我”成为大学生议论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人的目的？人的本质是不自私的吗？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一连串的问题引起大学生痛苦的思索和激烈争论。他们既有“人生道路越走越窄”的失落，也上升了“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雄心。这是个人与社会、价值愿望与客观现实的撞击。无可否认“自我”的意识在大学生们的思想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为人生观的主要观点。可喜的是8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7(2)班的同学首先提出了实现四化“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1982年和1983年又先后涌现出张华、华山拾荒英雄事迹；这一时期一些有抱负的大学生立志愿当边陲、边疆、边远地区去工作……

这犹如春天的红杏跳出墙头，表明一部分大学生走出“自我”的误区，把“自我”融入时代与社会之中。然而“自我”的潜流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和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导向，不断侵入越来越多学生的头脑。

改革的兴起，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方案的先后出台，使大学生振奋不已。他们以天然的天赋者自居，自觉从从未有过的振奋。他们对改革寄予无限希望与热情，自驱而不觉地把自己命运与改革联系在一起。1984年3月20日，当中国男排首捧“亚洲”杯时，北京大学的学生

欣喜若狂，喊出了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节，北京大学的国庆游行队伍在走近天安门检阅台时，突然展开“小平您好”的横幅，在国内外激起认同的反映。与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技术革命的影响相联系，在“改革热”的推动下，大学生因与改革认同，诸多行为受到社会的肯定，自我评价开始升值。他们试图尽快寻找与改革同步，在振兴中华的事业中一显身手的方式和途径。由此在大学生中迅速兴起的“党章学习小组热”、“社会实践热”、“追求新知热”、“注重能力热”、“要求自立热”。应该说，这是大学生这10年情绪最为热烈、激昂的时期。

进入1985年，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再加上大学生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他们思想行为的热点已开始转向“参与热”、“参政热”、“文化热”、“民主热”。一些大学生已经开始对改革中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问题表现出焦虑和不理解，对政治体制改革怀有急切的心理，对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科技引进、外贸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和对改革期望值过高的能量积聚，终于酿成了1985年“9·18”学潮。虽然党和政府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对学生上街游行、贴大字报的行为方式持批评和否定态度，但这并未被更多的大学生所理解 and 接受。

1986年，当社会上热烈议论政治体制改革时，大学生们兴奋不已。他们中的不少人把经济体制改革中反映出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这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在大学生们的思想上产生了种两种派别。当年年底到次年初，从合肥、上海等地首先发生了1986年学潮，随后迅速波及北京以至至少40多个大中城市。就在此时，邓小平同志再次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此，社会开始对大学生投来怀疑的眼光，报刊也不约而同地讨论大学生的弱点。

1987年以后，许多大学生通入了心灵的孤岛。他们觉得政府不理解他们爱国的热情，感到寒心。1987年底，署名“郎郎”的大学生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大声呼喊“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郎郎”一度成为大学生们的代称。他们陷入了沉重的失落：政治失落，人生价值的失落。前者表现出对社会、对政治的冷漠和孤独，发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不关我事”的艾漠；大学生对待“两个思潮”的冷漠态度，确实到了最低点。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巨大影响下，大学生们的思想异常混乱，对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和改革的模糊认识越来越深，信心逐渐下降。不久前看有关部门1986年6月和1988年6月对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数据：认为“非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富强没有希望，主张多党制”的，1986年为20.5%，1988年为21.1%；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优劣之分，主张搞资本主义”的，1986年为16.8%，1988年为34.5%。

大学生对个人价值的失落，一方面对“通货膨胀”、“知识贬值”、“脑袋倒挂”发出种种议论和不满。另一方面，新的“读书无用论”、“经商热”、“跳舞热”、“麻将热”、“恋爱热”充斥校园。

作为两种失落情绪的折射，1988年发生了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1988年4月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部分高校贴出大字报，强调“教育危机”，认为“知识分子境遇每况愈下”。北京大学的10多个研究生则跑到天安门广场要求人民代表撤皮鞭，其中最明显是显而易见。1988年6月北京大学一名学生因被流弹误打致死引发了小规模学潮，因此及时、果断，才未酿成更大范围的学潮，但学生们的愤怒是炙手可热的。

1988年下半年，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明显矫正，反而更加趋于消极和冷漠。首都某重点大学1988年底一调查表明，大学生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已上升到各种不满情绪的首位。厌学情绪仍在蔓延升级，不少学生以“托派”（考“托派”出国）、“麻派”（打麻将）自娱。

大学生是不甘寂寞的一群，他们决不会把枯燥、冷漠、失望作为自己思想行为的终结点。他们以往的熱情只是暂时的凝固，他们参与的欲望仅仅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机会，一旦爆发出来，必然会更加强烈。

1988年的“《河殤》热”、“东欧、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热”在大学生中悄悄地滚动，发展到冬天，一些高校政治性讲座、讨论、“民主沙龙”开始活跃起来。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跑到高校发表演讲，鼓吹“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同时，“新权威主义”也在高校成为一个新新的话题。随之引起的是学生中盲目的政治情绪在升温。

面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人们在焦虑、学生的冷漠与失望情绪的积压与离心倾向的焦虑、不知知觉与一个断裂点上，将会发生一场难以收拾的学潮。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五·四”。作为党、政、教育等部门、共青团组织，力图通过纪念“五·四”70周年，把当年学生的热情通过正常的途径引导到“爱国、奋进、创业、创业”的主题上。而那些心怀回测的人，则利用青年学生的情绪和幼稚，借“五·四”发难，掀起大规模的学潮。

这既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这场风波过早到来，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一些利用胡搞胡闹的逝世，制造了一连串国际以来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内容和形式最为激烈的学潮，并演变成全国性的动乱。最后在北京掀起反革命暴乱。就连许多学生在一阵狂热之后，也感到愕然。尽管如此，有相当多的学生还在为自己善良的动机辩解，对社会给予的责难表示委屈和不满。值得思考的是，几次学潮过后，相当多的学生未能因此觉悟、警醒，相反，学潮愈演

学情况，怎么能把教育管好？”
席家堡村建起一座占地50余亩的新学校，群众办学积极性很高，但教学质量提高不快，樊书记三次来到这所学校，和教师们一起探讨教学方法、教学时间、教学方法的教学怎样把思想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去。
现在，这所学校在县乡统考中已名列前茅。
“做教师的知心人”，樊茂枝常这样说。
——应县县城住房十分紧张，县委领导多次商议，为县城125户教师优先解决了住房地基。他一块到马石中学一名年轻教师不安心在山工区工作，便专程去这个学校呆了一夜，逐个谈心，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
近年来，应县教育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
1984年，该县成为基本扫除文盲县。
1985年，该县成为山西省普及初等教育合格县，并被命名为全省教育合格“十面红旗”之一。
1988年，在全国受表彰的100个扫除文盲县中，应县是山西省受表彰的4个县之一。

——这张张奖状、一面面奖状和一本本红烫金的证书，有着樊茂枝地图上的那些圈圈有着什么内在的联系呢？这种联系对各地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又有什么启发呢？



愈烈。学潮果真像有的人所鼓吹的那样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吗？是天然合理的吗？难道不应该对其自身有一点深刻而又真实的剖析？！

主观愿望与自身素质——处于分离或错位的状态

十年动乱对知识的路，

对人的摧残，造成了人才的青黄不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生而逢时，被誉为“天之骄子”、“时代的宠儿”。改革开放成就的激发，社会对大学生的肯定评价，加上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吹捧，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逐渐成为一种思潮，极大地强化了大学生的优越感和主体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与一般青年不同的几种主体意识，如精英意识、超越意识、参与意识，形成了一种大学生特有的文化心态。

精英意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学业竞争与拼搏，进入了大学，自此大学生就为校园内闪光的校徽而骄傲，似乎成了共和国的“高等公民”。在校园里都是公共场合，什么“北大入”、“清华人”、“南开人”，谁都认为自己是人群中的佼佼者。在一个还有近25亿文盲、半文盲，一万多人中才13个大学生的高度里，大学生无疑是宝贝。特别是人们越来越感到未来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大学生作为人才的预备队，自然会迎来羡慕的眼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使大学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滋长了一种自高自大的情绪，似乎改革也好、建设也好、惩治腐败也好，舍我其谁？有的学生直言不讳地说，10年之后他们就是部长、省长了，至于总理的位置，同样可以问津。正是这种精英意识，把自己摆在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不是放在社会之中，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其结果只能脱离人民群众，走向与社会现实和人民要求相左的方向。

超越意识。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批判意识较强，求新的欲望强烈，不满足于也不愿接受现成的结论，对传统的东西表现出天然的反感。当打回中国大门，看到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远的时候，当看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还存在某些失误的时候，当官僚主义、腐败现象蔓延滋长，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死灰复燃的时候，大学生表现出特有的敏感和不满情绪。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超越意识，由此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极为赞赏；对《河殤》拍手称快，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示厌恶。他们恨不能一夜之间就把社会上的种种落后和丑恶铲除干净，他们想一夜之间就把中国成为发达的国家。他们不能容忍现实，竟敢超越现实。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国情，他们忘记了任何超越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现实为起点的根本道理。所以，他们往往“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设计着中国的改革蓝图”，不能不产生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调式的可笑。甚至有时有的举动有点如同抓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狂的可笑。只是不少大学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

参与意识。与精英意识和超越意识相联系，大学生还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不满足于对时政的评论，而总想在实际上去表现自己，显示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兴旺，改革的成功，繁荣的降临，非有大学生参与不可。他们通过自己的呐喊，敲响警钟，非有大学生参与不可；通过自己的热情点燃所谓的“民主”、“自由”之火；想通过自己的呼唤，推进他们臆想的中国改革进程。由此，他们把大学生上表示成“孩子”表示厌恶，告诫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还表示反感。他们就像充满了风帆的帆船，不待自燃就要冲向大海；他们就像拉满了弓的箭，还未校准目标就要发射。由此可见，他们的热情不免包含着浮躁，他们的参与难免夹杂着盲动。

超越现实总结与反思的是，在大学生中所具有的精锐意识和价值观的参与意识，使他们在自以为是的、住住在精英主义和个人的过去时，却回避了自己的不足。正是他们主观愿望和自身素质的差距，使他们的行为效果与他们的主观动机相去甚远，甚至背离。

客观地对大学生的主观意识与自身素质作一番认真分析和比较，或许我们或到把一些大学生的毛病放在哪里，他们对一些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但以偏概全，因此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和动摇。他们对改革充满了热情，但不了解国情，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缺少对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前进的矛盾的分析能力。他们对外中各种思潮表示欢迎和兴趣，但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所知甚少，表现出对马列主义的偏见和误解，甚至认为已经过时了。

经过对民族文化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兴趣，导致有的学生把资产阶级的哲学学为经典，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不觉地成为观察问题的方法。他们要求民主，但弄不清民主为何物，往往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为参照系，割裂民主与法制的联系，甚至在要求民主的过程中采取了反民主的方式。

他们强调个人的主体意识，但割裂了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自我”作为人生的支点。他们欣赏对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竞争意识、时效观念、效率观念表示欣赏，但又同时留恋着铁饭碗意识、终身金主义、无用主义思想。

他们要求参与，但参与的热情和要求，与参与的能力和主导思想，表现得极不相称，有时难免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见，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严重缺陷，导致了与其主观愿望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然要乘虚侵袭他们。事实是在去年大学生中已普遍产生了一种跟着感觉走的心态，所以一遇风浪就发生动乱。在这次学潮和动乱中，不少同学由跟着感觉走到跟着情绪走，以致发展到听信“美国之音”，跟着谣言走，卷入动乱的泥沼不能自拔。

教育与导向——缺乏旗帜鲜明的主旋律

风波之后，痛定思痛，这么多学生卷入学潮和动乱，决非偶然。究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放松马克思主义教育、放松对学生的政治要求，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



南开大学数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叶剑平（右一）、吴喜之（左一）及进修教师侯自新（左二）近日由国外回国访问。叶剑平年仅24岁，是南开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图为系主任汪光健教授在同行们进行座谈。

李星蛟摄

和其它错误思想侵袭学生。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些年国内的小气候问题和思想上对青年学生的一个错误导向，包括对学生的政治导向、思想化导向、社会价值导向、新闻舆论导向上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图引起我们深刻的反省，吸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政治导向：突出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问题上，不鲜明，不直理气壮，往往只是被作为一种“标准语言”引用在文件中，甚至被视为“套话”、“空话”。赵紫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说不清。这既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壮了胆，也造成了人们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思想理论界，什么社会主义“早产论”、“失败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党的领导“淡化论”等等，十分流行。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和平讲阶级分析论的方法和阶级斗争，只强调宽容、宽松。从和平和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时，对国内和平生产和生活看得多，对国际资本主义对我搞“和平演变”的卑劣用心分析揭露少。这些都淡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因赵紫阳同志的包庇和纵容，大肆宣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鼓吹“全盘西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不少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淡漠、怀疑甚至动摇。

思想文化导向：随着开放，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理论纷纷涌入我国，而我们缺少认真严肃的分析和扬弃，致使这些东西很快在大学生中流行，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相反，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十分薄弱，而且往往采取挑剔的态度，使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光辉。据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组的抽样调查，有22.7%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门科学，与其它科学是平权的，不能指导其他科学。在有的学校持这种看法的人达53.1%。某院对研究生进行一次调查，认为科技人员“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占11.7%，认为“略知一二”的人占24.9%。相反，在校内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河殤》热”。什么《自我论》、《首论论》、《箫——一个新中国的新世界》、《人性的优点》、《人生的弱点》、《丑陋的中国人》成为大学生的流行书目。这种资产阶级的影响，使个人主义的思想、唯心史观、民族虚无主义侵入到学生的头脑中。

社会价值导向：价值观念是人生观的核心。我们所崇尚的社会价值观念是集体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是奉献精神，是把自己的理想、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这种共共主义、道德观、价值观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对立，最根本的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是集体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对立。而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个人主义是一切。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缺少宣传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相反，有人还打出“雷锋精神”是“左”的产物。更有甚者，打着“观念更新”的招牌，大肆鼓吹“一切向钱看”的“实用论”，鼓噪要突出“自我”，进行“人性解放”。这种唯我主义的渲染，使一些大学生把“我是目的，我就是一切”、“我最崇尚自己”作为人生的格言。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必然成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利益上的利己主义的思想基础，其结果势必在利益要求上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在与人的关系上，唯利是图；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

新闻舆论导向：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媒介趋向大众化、社会化。新闻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情绪和思想走向，它既是群众情绪的指示剂，也是群众情绪的催化剂。良好的新闻舆论能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产生凝聚向上的力量，错误的新闻舆论则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回顾这些年来新闻舆论导向，青年学生中形成的诸多“热点”，与新闻舆论导向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潘晓讨论”的结果，无论使一些人的观点出现分化、系统化。报刊关于“王”型人才、分析型人才、尖子人才的宣传，使人们对人才的理解产生片面性，产生了重智轻德的现象。学生中形成的“西方哲学思想热”、“政治体制改革热”、“中西文化比较热”、“《河殤》热”等等，都与新闻舆论的渲染不无关系。至于当时对冤假错案的“蛇口风波”，则被某些报刊极力渲染，有人借机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群众思想的极度混乱。回想这次风波的骤然升级，无疑与新闻舆论的错误导向以及推波助澜有关，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出路和途径——四项基本原则是育人之本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反思这次风波所暴露出的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放松了对青年学生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忽视了学生的政治方向的培养和引导，导致许多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政治方向上发生了偏离。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青年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历史将要把他们推到接班者的位置。

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社会主义前途计，从学校到社会到家，从思想理论意识到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都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教育之本，渗透到学生成长的各个环节，当前要特别注重抓好几个方面的教育。即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坚持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法制的教育；加强对青年进行国情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的青年一代是完全可以有作为的。

今天的大学生一定会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中清醒起来，成熟起来，同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一起成长，肩负起建设21世纪的伟大历史使命。

